

拉丁美洲動盪不安中的天主教大會

王建勳

壹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衰落

拉丁美洲在很久歷史上，幾乎全是羅馬天主教的天下，到現在整個拉丁美洲二億八千萬人口當中，仍有98%的人是天主教徒，此外是極少數的基督教、猶太教、回教及英國國教。

天主教得以盛行於拉丁美洲，主要是在殖民統治時代，西班牙與葡萄牙正實施政教合一，教會實質上是屬於政府的一部份，因而天主教亦就在拉丁美洲建立了它獨佔的權威。當時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會，不但可以管理人民，並且可以干預政治，而它本身却享有各種特權，不受法律的限制。在這種情形下，人民生活幾乎無法脫離教會勢力範圍，信奉天主教已屬於人民的一種義務，而其政治方面亦處處受到宗教的約束與影響，相沿下來，政、教間的關係就成為拉丁美洲諸多問題中一項極為複雜的問題了。

拉丁美洲各國紛紛獨立以後，在政治上就開始擺脫天主教會的控制，在各國政府不斷發動政、教分離運動下，就引起了政、教間的激烈鬥爭。特別是墨西哥，它在一八五七年就開始以憲法規定，來限制教會的影響與特權，一八五九年復將教會財產收歸國有，到了一九一七年，其反對天主教的意識就更加強烈，不但儘量排除天主教壟斷的信仰，並使教育完全脫離教義，因而在一九二六年，在政、教爭執中，最後雙方不惜以武力相見，直到一九三六年，在墨西哥政府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以後，政、教間的關係始見好轉。但是此一影響，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勢力，亦就大不如前了。

所以在墨西哥政、教衝突以後，實際上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已逐漸脫離了宗教的影響，迄今除了阿根廷憲法仍規定總統與副總統必須是天主教徒以外，大多數國家都在憲法中強調人民有信仰的自由，當然在政治活動上，是不會再受到宗教的限制。在天主教會方面，在失去其對政治的影響以後，已是一蹶不振，而另一方面，由於它仍承襲着殖民地時期長久以來少數具有財富人們的傳統影響，亦逐漸失去了大多數貧窮教徒們的信仰，加上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動盪不安中的天主教大會

的教士們的神修生活極為痛苦，更使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發展發生困難。就如一位頗為熟習拉丁美洲天主教會情形的神父、巴西勒希非（Recife）神修院教授孔伯蘭（Joseph Conklin）最近所指出：目前拉丁美洲大陸，每六千名受洗者僅能產生一位教士。多年來人們曾建造很多堂皇的神修院，但是現在很多已空無人跡，因而人們都計劃如何把它賣掉。他又說：自一九五四年起，迄今十三年來，在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國人口在同時期內幾乎增加了一倍，但神修人員反而減少達50%，若干小規模神修院，亦經常只能收到由父母送來未受到良好教育的學生，若干較大規模的神修院，其學生能夠到達高級研究的比例亦不超過15%。孔伯蘭神父所指出的這種情況，實際上已成為拉丁美洲聖職界的一項危機；因為天主教的教規使聖職人員必須要守獨身，但是在拉丁美洲地區，由於氣候溫和的影響，過着「不規矩」生活的教士已越來越多。而在天主教的傳統方面來說，「信心」的動機不能把「感情」的動機理性化，而聖職界變成僅僅是感情的飢渴問題，那麼結婚之後，所有目標與信仰都將背道而馳，而天主教吸引人之處亦就隨之消失了。

因此，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會面對此種「失血」情形下，不得不召請外籍神父，但其數字與希望仍相去甚遠，只能達到40%。同時，由於外籍神父缺乏共同的語言，不但在文化上有着隔閡，相互交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無形中亦把教會與教徒分開，在教會活動受到限制以後，就有「魂不附體」的感覺。所以現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會對此一擁有廣大教徒的地區，已無法完全照顧，幾十個教士散佈在平民之間，亦僅似滄海一粟，無濟於事，正像「輕藥」不能醫治「重病」一樣，天主教已不能適應拉丁美洲的社會環境。因此，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到一九六六年間，在羅馬舉行的歷屆世界主教會議所擬具的各種改革，尤其是自大公會議兩年以來，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就已有着「一種新的趨向，那就是傳統的教會制度（修女、修士、聖職人員）都主張教會應支持革新。此外，一些聖職人員鑑於拉丁美洲的窮人們，在意識上反抗「支配階級的剝削」問題已日愈嚴重，以及那些在混亂情況中受難者們的要

求，他們就更主張天主教應贊助於窮人，所以他們在福音上經常告訴那些貧困的人說：「窮人是耶穌基督特別眷顧的人」。

貳 天主教的革新與「人民革命」運動

近年來，由於拉丁美洲不斷爆發共黨動亂及日趨不安情況的影響，天主教會中一些較為激進的聖職人員就認為，今日拉丁美洲所受到的威脅，並非單純來自於共黨顛覆陰謀，而是來自於拉丁美洲國家本身各方面的複雜問題，因為從歷史上看，拉丁美洲問題不是開始於馬克思，現時的共黨顛覆所以與拉丁美洲成爲一個不可分的關係，其原因乃是共黨利用了該地區一些複雜的社會問題，而乘機製造動亂。因此，他們就主張打破教會傳統，走出天主教大門，而冒險介入到「人民改革行動」當中。所以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與宗教間，其複雜性也就愈來愈深，此一情況，我們可從下面一些顯著的實例來說明：

一、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尚有40%的人是文盲，80%的國民所得落入5%人們的手中，雖然哥倫比亞政府已開始從事土地改革，但仍是1/5的人擁有80%的土地。據哥國政府衛生部說，由於哥國人民多數都生活在飢餓與貧困中，因而每月有數以千計的嬰兒被遺棄。尤其多數人民都過着貧窮的生活，兒童失去教養，流浪街頭，而淪爲偷竊。因此，近年來，在哥倫比亞天主教會方面，就有很多青年神父支持貧苦人民的「政治革命」運動，其中有一位很激進的神父杜瑞斯(Camillo Torres)，就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參加了哥倫比亞山區的游擊隊，但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政府軍一次清剿行動中被擊斃。而在他被殺死亡後兩年來，他的「犧牲」却成了拉丁美洲激進派聖職人員一種意識上的感召，認爲杜瑞斯是將自己的「愛心」奉獻給苦難人民，故應成爲他們的榜樣，因而一些青年神父及包括大學生、工人和農民的教徒們，在拉丁美洲各地紛紛成立「杜瑞斯革命運動」的組織(Comando Camillo Torres)。此一分佈在各地的組織，在經過一位阿根廷神父加西亞(Juan Garcia Elrrio)從中煽動與聯繫以後就更爲變質，這些組織乃主張以「暴力」來改變拉丁美洲國家所有不合理的結構。加西亞神父思想左傾

，他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曾在阿根廷大教堂打斷了正在進行中的彌撒，而面對着阿根廷總統和他的閣員們大談「人民革命」，然後他逃出阿根廷到處流浪，最後到了烏拉圭，就與一位烏拉圭神父加勞斯(Juan Carlos Zaffaroni)、一位墨西哥神父彼得得魯(Pedro de Euzcardia)等負責與拉丁美洲各地的「杜瑞斯革命運動」組織從事聯繫。

二、在南美洲的巴西，天主教支持「人民革命」運動方面，早已對拉丁美洲產生重大影響。遠在一九六二年，在巴西東北地區，就有一些神父鼓勵人民從事「政治革命」運動。而後巴西東北地區勒西非(Recife)總主教埃爾德(Dom Helder Camara)就公開聲明，指出巴西東北地區的人民，在少數大地主剝削下，飢餓與貧窮已達無法生存的地步，而他呼籲巴西政府如再缺少果斷行動或繼續等待，終將被那不可避免的「革命」所淹沒。巴西各教區的聖職人員以及教徒們亦表示願意支持巴西人民基於一種「正義」的「革命運動」。而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巴西東北地區十二位主教在勒西非集會，會後更聲明指責巴西政府沒有「正義」，表示他們不能漠視在巴西特權壟斷下的那些難以忍受的制度。所以此後在這一擁有93%天主教徒的國度裏，歷次學生的示威以及人民的反抗，實際上，都已獲得宗教方面的鼓勵。巴西總統戴西華(Costa e Silva)雖與天主教方面舉行會談，但並無結果，直到埃爾德於今年五月廿五日又發表一個有關支持「暴力革命」的聲明以後，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就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他說：人們瞭解到，無論是「解放」或「解救」的暴動，我由良知上尊重那些不得不選擇暴動的人，但是我所指選擇暴動的人，並非是那些在「房間」內談論游擊戰，而是那些「犧牲」了生命的人員，並且亦可以預料到，假如拉丁美洲勢非爆發動亂不可，我們可以肯定列強將立刻介入，甚至亦不經宣戰，拉丁美洲就成爲新的越南。

然而這些激進派天主教聖職人員的行動，在保守派者來說，顯然天主教內部就發生了爭論，如出生在法國的巴西西北地區的主教、保守派領袖波昂撒(Mgr Gerardo Proença Sigaud)、主教伯蘭都(Mgr Avelar Brandao)和智利聖地牙哥紅衣主教賽爾華(Raul Silva Henriquez)等，都極力抨擊「暴力革命」，更反對聖職人員或教徒存有「游擊戰」思想，認爲從事「暴力革命」的人，就是褻瀆天主的魔鬼。到了今年七月廿九日，羅馬教皇保

祿六世(Pope Paul VI)發出其「關於人類生命」的通諭(Humanae Vitae)，重申教會歷史上一向反對所有一切「人爲的」方法防止生育立場以後，其拉丁美洲宗教界的危機就更加嚴重起來，那些較爲保守的高級聖職人員均支持教皇，但許多神父、教士和教徒們却公開反對；在他們認爲，拉丁美洲的落後與貧窮，主要是來自於人口增加的壓力。而事實上亦確是如此，拉丁美洲人口，從公元開始的六千三百萬，迄今已達二億八千萬了，一九五〇—六〇年間，非洲、亞洲的人口增殖率還沒有超過1.6%的時候，拉丁美洲的人口增殖率就以2.5%急速增長，而當前拉丁美洲的增殖率更高達3%以上，所以拉丁美洲的人口，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七年間就增加了八千萬人。因此，近年來，在拉丁美洲教徒中，所有婦女使用避孕的方法，均已被教會所默許。這種情況，正如天主教會的激進派與保守派間在「暴力革命」上所起的爭論一樣，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悠久歷史中是最嚴重的一次衝突，而在羅馬天主教當局方面，它在擁有廣大的天主教徒的拉丁美洲地區，必須要在危機中尋找一個緊急對策。

叁 「聖體大會」、「主教會議」及教會內部的爭論

在目前拉丁美洲很多國家都處於學、工潮動亂以及天主教會內部晦暗不明的局勢下，拉丁美洲天主教和政界人物就以一種希望和焦慮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在宗教和社會領域內的兩件大事：一是八月廿一至廿三日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Bogota)舉行的天主教第卅九次世界聖體大會，一是自第一次大公會議以來，將於八月廿三日起在哥倫比亞梅德蘭(Medellin)舉行爲期十五天的拉丁美洲第二屆主教會議，羅馬教皇保祿六世將蒞臨主持。

在人們表示希望與焦慮方面，乃是保祿六世可能對拉丁美洲的農民、工人、教士、主教等發表一連串演說予以特別重視。因爲在拉丁美洲廣大的天主教徒們來說，他們認爲拉丁美洲最後命運的決定，並不是目前特殊的環境，而是依據歐洲教會的需要，因爲教會的法律是依從歐洲天主教歷史傳統，而不是別處的歷史傳統。但是當前拉丁美洲的教會，在其頗值憂慮的內部困難當中，而非基於原始規定的「教諭」來發展，因爲教會的一切規定，已使

得問題更加嚴重，就如保守與激進派間的衝突，都已更加深了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社會間極其複雜的情勢。亦因此，在梵蒂岡方面，就不得不預先在主教會議預備會議上設法控制，因爲這是唯一給予保祿六世確切說明天主教真理的良機，假如他的意見含糊不清，在此一落後地區的羣衆將會產生誤解，誠然的，政治與宗教的複雜性將更趨嚴重。

所以在保祿六世還沒來到拉丁美洲以前，在天主教方面就起了很大反應，尤其那些激進派，更擔心在他們支持人民「暴力革命」方面會受到教宗的譴責，所以他們就發動各種運動，以向羅馬天主教皇表示他們的意見：

一、早在本年三月五日，阿根廷神父加西亞就在烏拉圭首都蒙特維的亞(Montevideo)召集來自於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烏拉圭的五十名教士和一些世俗教徒們舉行爲期三天的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爲了籌備於一九六九年預定在古巴哈瓦那(Havana)舉行的「哥倫比亞神父杜瑞斯追思大會」，它亦將是拉丁美洲所有主張「暴力革命」的聖職人員及世俗教徒們的一次會晤，以作爲他們支持「人民革命」運動理論和政策上的檢討。在這次會議中，除了通過上面保祿六世，請他放棄前來哥倫比亞主持聖體大會的計劃外，並決定聯合拉丁美洲各國已存在的「杜瑞斯革命運動」組織，使其在「人民鬥爭」方面必須接受馬克思的理論，以與所有在革命鬥爭中的教徒結成一體。

二、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有屬於「杜瑞斯革命運動」組織的二百五十位神父及包括學生、教授、工人和政府公務員的教徒們，在八月十四日，呼喊著「宗教自由化」的口號衝入了聖地牙哥大教堂，佔領教堂以後就關閉了教堂大門，在他們單獨舉行彌撒的時候，乃以吉他伴奏，齊唱「革命」歌曲，並且不斷爲拉丁美洲所有被剝削人民而祈禱，直到傍晚才離開了大教堂。在他們佔領大教堂的時候，曾對記者表示他們並不是單純的反對保祿六世到拉丁美洲訪問，而亦是反對陳舊並具有貴族化的天主教會組織。但無論如何，聖地牙哥紅衣主教賽爾華在事後仍停職了七位參加這次示威神父的職務。

三、在巴西教會方面的反應，可說是最重要的了。那就是在巴西勒西非總主教、拉丁美洲天主教自由派和激進派的發言人埃爾德所領導下的五十位神父，共同起草了一個呈獻給教皇保祿六世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首先指出目前拉丁美洲人民，有九千萬是富有的，有一億九千萬正遭受到生活的壓迫

，尤其是南美洲安德斯山脈（Andes）一帶和中美洲地區的印第安人以及巴西東北地區的農民們，他們都在被少數地主剝削下過着飢餓的生活。因此，拉丁美洲有70%的兒童都是貧弱不堪，而影響到他們生活和心理健康以及智慧的發展。它又指出，幾個世紀以來，拉丁美洲一直是在少數特權實行對多數人民的統治與壓迫，以致其政治、文化、經濟等都无法進步和發展。因此，它特別對拉丁美洲當前經濟情況作了較詳盡的分析，它認為：迄今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因不足以配合人口的膨脹而毫無進展，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每年尚未達到三百美元。而其經濟發展另一障礙，一方是各國間不能停止其本身利害上的衝突，一方是有很多國家的社會結構仍處於混亂狀態，所以拉丁美洲的生產所得無法增加，至今仍只是歐洲的三分之一，北美的七分之一，以其經濟發展速度太慢，而難以達到歐洲的水準，按目前現況比較，相差有四十五年。此外，這種經濟不能進步的現象，與其政治、文化方面亦有很大關連；拉丁美洲目前仍有50%的人是文盲，所以雖有少數人已瞭解到一個真正民主方式的重要，但很容易的被那些寡頭政治或軍事獨裁所破壞，以致今天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已告徹底失敗，因為這些力量不但左右着拉丁美洲的政治，並且還加緊對人民實行壓迫，使那些未開發鄉村中的人民，都是在極不合理情況下生活。這種政治上的影響，正如教皇保祿六世所說過的：「政治的基礎就是經濟進步的機器」，而拉丁美洲却早已喪失了這一條件。譬如拉丁美洲國家，在它們長久以來用於軍事上的浪費，以及一些統治階層只知道保護私人特權的利益，而沒有一種方法努力於發展教育，培植工業，而使拉丁美洲人民無法逃避他們的無知與貧困的生活。亦由於這種關係，拉丁美洲各國就難以抵抗「帝國主義」的資本侵略，而今日「帝國主義」就利用了拉丁美洲此一良好的手工業市場來逐漸擴展其資本勢力與影響，同樣的，「帝國主義」以借貸的方式來表示一種善意的照顧，但事實上，它亦只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以達到其國際商業化的目的。

最後談到目前天主教會是在拉丁美洲所應採取的立場與態度時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暴力革命」已經是解決當前問題上一個不可避免的方式。雖然宗教不應該贊成那種屬於「階級鬥爭」的制度，但教會却應贊助建立起一個很有效的解決方式，而很客觀的來解決世俗間的問題，所以無論是教徒或非教徒，當他們尋求更多自由的時候，在天主教方面，起碼是不應該給予

更多的阻力，何況以拉丁美洲人民的處境，他們的「革命行動」是符合福音上所說的「博愛」和「正義」的精神。因此，我們不相信人類為改變其社會結構而急需要建立起一個具體而有效的行動時，就是屬於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一種制度，因為人民的革命行動是由壓迫者的暴力所引起，被壓迫者的反抗只是一種基於本身權利遭到重大損害時一種「合法的防衛」而已。所以他們乃請求教宗在其未來的大會演說中，不要譴責人民在合法防衛下的「暴力革命」，相反的，他們要求教宗應聲明支持人民有「合法防衛」的權利以及爭取自由的「革命行動」，而保證拉丁美洲所有天主教徒在選擇並貢獻其為一個真正的拉丁美洲自由工作上所具有的最大權力，使其能採取確信可獲得這些自由和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而與那些具有善意的人們密切合作。

另外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方面，來自於廿四個國家出席拉丁美洲主教會議的代表——一百五十位主教們亦準備了一個文件，以作為他們在會議中討論的基礎。這個文件大意亦是說，當前拉丁美洲所普遍存在的寡頭政治、富有或特權階級以及外國的資本等，都是使得拉丁美洲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所以他們主張拉丁美洲必須要及時而徹底的實行改革。此一文件於今年七月十六日在波哥達時報（El Tiempo）刊載以後，不但使得在拉丁美洲的一些美國大資本家感到不安，並且亦引起了在波哥達與米德蘭方面的熱烈反應。

肆 教皇的演說——反對「暴力」、呼籲「改革」

羅馬教皇保祿六世，在其仍是意大利米蘭（Milan）紅衣主教的時候，曾到過世界最大天主教國家的巴西，但是保祿六世此次以教皇身份來到拉丁美洲，在羅馬天主教歷史上說，尚屬首次。在保祿六世離開意大利選擇拉丁美洲作為他第六次旅行以前，已很清楚的瞭解到拉丁美洲當前的各種情況，所以他動身以前，就曾作了一個很簡短的聲明，他說：「暴力革命」不是解決政治、社會以及宗教問題的方法。他認為，在拉丁美洲來說，只有用教義中的「愛」才能造成社會正義。在他談到現在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都處於混亂當中的時候，他說：據說在那邊的動亂以及教會中的爭論將使我們作最堅強的忍耐，就如同我們所瞭解的那種情形下所應有的「仁慈」和「忍耐」一樣

。所以他呼籲教徒們說：我們不要再以另外的一些時期來論斷，在那些時期，天主教和教皇自己都是依靠軍隊的力量，但是在我們來說，時間已不再容許我們使用「劍」和「權柄」了，同時，爲了「正義」和「進步」，亦是必須如此的。

正當拉丁美洲學、工潮不斷以及教會內部激烈衝突中，這位擁有世界五億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终于在八月廿二日下午二時到達南美洲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在那裏有來自於世界各地二百五十萬信徒、五十國的天主教領袖包括紅衣主教、總主教、主教和神父等二千五百人，還有來自於各地的天主教學生代表一千人，都在等候保祿六世的蒞臨。在教宗的專機抵達波哥達的時候，曾受到哥倫比亞政府官員以及教徒們的熱烈歡迎，他在一片歡呼聲中乘車駛往波哥達大教堂，在爲羣衆祝福以後，就前往梵蒂岡駐哥倫比亞大使館下榻。在下午他曾往聖教堂爲一百卅八位神父主持晉典以及拉丁美洲有史以來第一次兩名教士的婚禮，因而人們認爲從宗教到世俗，天主教或已建立了未來新的發展。

在波哥達郊區的聖體大會場，佔地廿四公頃，有高聳雲霄的安德斯山脈所裝飾成一個美麗而莊嚴的背景。在會場四週懸掛着所有參加這次聖體大會國家的旗幟，迎風飄蕩，在這些旗幟中，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古巴的國旗，據說這是因爲哈瓦那一位神父是在那裏。哥倫比亞政府爲了保祿六世的安全，在現場派有一萬五千名軍警，像木欄一樣的圍繞着這個會場，因而在聖典進行時，信徒們多遠在圍牆之外，感到對儀式如此遙遠，人羣亦比例延長幾達廿公里，在會場中的每一座位雖寬到八十比索，但仍然是座無空席。

這次大會的程序，在八月廿日就首先舉行了一次世界公教會會議，一位哥倫比亞英國國教會（Anglian）牧師，一位德國路德會（Lutherien）牧師和一位正教會（Orthodox）牧師，由教宗地區代表、樞機主教賴卡（Lercaro Legat）主持下輪流發言。賴卡和發言時曾提出一個動人的建議，他說：「穿兩件衣服的人，應給別人一件」。他的言論當然是使有錢的人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亦是代表教宗敦促政府進行必要改革。然而他最主要的意義，乃是說明此次聖體大會似乎是沒有忘記喚醒基督教亦同樣啓發「良知」的機會。接着廿一日是慶祝洗禮，廿二日是由保祿六世主持的法語大彌撒，之後又舉行一次盛大的懺悔大典。

教宗在聖體大會中，沒有發表什麼演說，所以八月廿三日由保祿六世所主持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開幕典禮才是一個高潮。因爲聖職人員以及包括農民與工人的教徒們，久已耐心等待着，期望能親耳聆聽保祿六世對拉丁美洲天主教與拉丁美洲當前重要情勢所引起的爭論方面有着決定性影響的演說。

保祿六世终于在主教會議開幕典禮上發表了他的演說，他在演說中首先就指出拉丁美洲的社會是不公正的。他說：在我們聽到你們悲慘的呼喚，知道你們都在爲了基督的顯耀而忍受着痛苦，所以即使你們的「真理」遭到不幸，「基督聖體」却永遠與你們同在。然後他繼續指出現在拉丁美洲大多數人民生活困苦時，認爲主要是由於社會階級不平等、少數富人的剝削所造成。他說：他曾不斷的呼籲所有人民都應獲得公平的報酬、合理的住屋以及接受教育的權利，並且在逐漸實施大衆福利政策下，公共衛生亦應獲得改善，但是迄今行政、司法仍極混亂，稅捐更爲繁重。所以他就譴責了那些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自私、政府的浪費和加強軍備支出所造成的人民負擔。

在保祿六世談到當前人們所最感憂慮的問題時，他說：在他的旅行中，如果不能接觸到問題的重心，那就毫無意義了。他表示據他的瞭解，拉丁美洲的青年已經是被以「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方式所吸引了，但這不能不說是在少數貴族剝削與壓迫所引起的反響。然而保祿六世却反對這種「暴力」的意圖，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暴力」不是「福音」，更不符合基督的「教義」，其關鍵是應該在經濟與社會進步方面去尋求漸進的改革，使所有的人都能融合在這一改革意願當中。所以他強調的說：所有以「暴力」來改變社會情勢的方法，即使它能在冒險中獲得一時勝利，但最後它仍不會成功的。最後保祿六世以警告的口吻說：不要忘記某些歷史上，由於不同目標所造成複雜情況而終於導致成嚴重的危機，所以拉丁美洲如果要避免革命的爆發，就必須一致而勇敢的從事改革。

保祿六世的演說，不但對「暴力」問題講的非常清楚，並且對拉丁美洲政府亦作了嚴厲的抨擊，因此，有些拉丁美洲國家的報紙，就以「保祿六世的控訴」作爲大字標題。事實上，保祿六世熱情洋溢、果斷銳利的講詞和有力的音調，曾獲得聽衆十二次掌聲和多次的歡呼。在保祿六世演說完畢，所有聽衆對其不隱藏任何「蠱惑」和「輕率」的信念都表示極高的敬意，由衷的使他們在保祿六世的精神感召上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所以拉丁美洲各國

的報紙，亦都以巨大篇幅刊登保祿六世的講詞，並且一致評論教宗的演說是代表「所有智慧的源泉」。

伍 結論

拉丁美洲地區，由於長久以來的政局不穩、經濟落後、貧富懸殊、普遍貧窮、愚昧、文盲以及反美情緒等，而成爲共產主義蔓延的最好溫床。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赤化以後，來自於國際共黨的滲透，使共黨勢力更逐日增長，大規模的共黨顛覆活動首先在委內瑞拉展開，此後，哥倫比亞、祕魯、玻利維亞以及中美洲的多明尼加、瓜地馬拉、海地等國家亦相繼爆發了共黨動亂。此外，巴西、智利、烏拉圭等很多國家，由於近年來不斷遭到通貨膨脹的威脅，使其主要政黨間發生分裂，因而亦給予共黨乘機製造騷亂的機會。去年四月間，玻利維亞又面臨共黨顛覆的危機，最後在政府軍一次圍剿行動中，古巴共黨游擊隊頭子蓋瓦那（Ernesto Guevara）終被擊斃，但是共黨却又利用其偶像來煽動青年暴亂，所以在今年歐洲五月學潮以後，共黨就很容易的利用了青年的衝動以及他們對社會結構缺失、美國資本過份發達等不滿心理，控制了學生的自治活動。然後就先後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地爆發了「青年革命運動」，而使拉丁美洲又進入一個新的危險而動盪不安的局面。因此，由於拉丁美洲五年來不斷爆發動亂的影響，天主教方面亦就跟着發生一種改變；不但在其教會本身制度上普遍要求革新，一些較爲激進的聖職人員在對社會領域間支持「人民革命」的呼聲亦越來越高，人數亦越來越多，他們不願教會傳統而走到貧苦大眾當中。當然，這在拉丁美洲各國政府來說，實在是一個頗爲恐懼的現象。

人們亦會想到，保祿六世前曾在「一項「人民進步的通諭」中（*Encyclical* *Populorum Progressio*）說過：「當人民的基本權利顯然遭到壓迫而達到無法生存的時候，在傳統的天主教義來說，其所引發的「人民革命」應該是合法的。但是當保祿六世看到拉丁美洲天主教內部，在不斷增長中的「暴力革命」思想上，已經逐漸結合成一種「人民革命」運動，而多少都助長了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與「社會革命」的風潮時，他又不得不設法制止，尤其是在其「關於人類生命」通諭以後，使其教會更處於可憂慮的內部困難

當中，亦必須設法緩和那些聖職人員激動的情緒，所以保祿六世在演說中反對那些主張使用「暴力」革命的人，無疑的是他期望暫時壓制天主教在這方面發展中的錯誤，並且亦使得那些焦慮不安的政府獲得安心。

但是就在教皇保祿六世回到羅馬後不久，非但拉丁美洲學生暴亂未停，墨西哥學生騷亂最後亦演變成大規模「流血革命」運動，這在保祿六世來說，他不但對此次拉丁美洲之行感到黯然神傷，並且更擔心這種無法制止的青年浮躁以及崇拜暴力狂熱的例子將會繼續在那些青年神父中蔓延，因此保祿六世在其誕辰前夕接受民衆觀見時，就嚴厲的指責了那些暴亂的青年們所表現的偏激行動，他堅決表示教會是不接受這些追求自由而貪求暴力表現的人。

然而保祿六世對於「暴力」的拒絕，是否真能制止此種「革命狂流」，一般來說，仍要看各國政府是否有果敢實施改革的意願而定。因爲一般認爲，當前拉丁美洲動盪不安的情勢，雖具有非常複雜的原因，但在各國間環境不盡相同下，人們藉製造混亂的目標以表示其對現狀的不滿而要求實施改革的意願則屬一樣，這可從拉丁美洲國家中深具良好政治基礎的墨西哥與烏拉圭亦難逃避混亂即可證明。此一情況，亦可以一九六五年四月「多明尼加革命」以後，美國詹森總統的一段演說來說明，他說：當共黨企圖利用拉丁美洲任何一個地方人民所遭受到的困苦時，則整個自由美洲制度便會進入高度危險情況中，而屆時共黨將會越來越起勁的利用暴力手段在大混亂中試圖建立本身的力量」。

但是拉丁美洲國家政府，長久以來都不願面對現實，承認本身的缺點，在國內爆發動亂的時候，亦只是儘量排除屬於極少數的「叛亂組織」，諸如最近墨西哥政府指控國際共黨的顛覆陰謀；烏拉圭政府驅除三個從事顛覆的蘇聯大使館官員；甚至於古巴卡斯楚亦譴責其國內屬於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份子」的破壞行動等。但是一切動亂的發生，必有其根本原因，如不予改善，則後患仍是無窮。所以最近美國指派前駐越南美軍統帥魏摩蘭將軍（*William Westmoreland*）爲了加強拉丁美洲大陸的軍事安排所召開的美洲軍事會議，如美洲各國能採行軍事合作抵抗共黨侵略，固然可以發生一些效果，但是保祿六世此次對拉丁美洲各方面所作譴責與呼籲，其在拉丁美洲人民間所引起的反響，亦是美國以及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所不應該忽視的。（八月十七日脫稿）